



梁启超的两种进化论及其政治含义

李军科

(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, 福建 厦门 361005)

摘要:梁启超的很多政治思想和主张是建立于进化论的思想基础上。梁启超进化论的思想,除了从康有为那里采纳了三世大同说这种进化论之外,他还从严复那里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。然而,我们从梁启超思想的两种进化论中,发现这两种进化论之间其实是有差异的。因此,要成为一个融贯的思想体系,梁启超必须有一种策略,以将二者融合起来。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,并进而为其整个政治思想体系打下了基础。

关键词:梁启超; 进化论; 融合

中图分类号:B259.1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1004-0544(2012)05-0068-03

梁启超从康有为那里接受了三世大同说,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。而除了从康有为那里采纳了三世大同说这种进化论之外,他还从严复那里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。他在《说群序》中很明确地提到,受了严复的影响:“既乃得候官严君复之治功《天演论》…读之犁然有当于其心。”^①我们可以说,第一种三世大同说是“中国的进化论”。梁启超在《论支那宗教改革》一文中明确说到:“不可不发明孔子之真教旨,而南海先生所发明者,则孔子之教旨…进化主义非保守主义”。^②梁启超一直到了晚年还对大同学说念念不忘,没有放弃。第二种是“西方的进化论”。他在《放弃自由之罪》中说到“夫物竞天择,优胜劣败,此天演说之公例也”,^③因此至迟在此时(1899年)他就已经接受了天演论。^④梁启超为什么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?两种进化论之间有何差异及如何融合?进化论与梁启超的政治理论是如何相关联的?这是本文致力解决的三个问题。

一、三世大同说

虽然是康有为提出了三世大同说,并且梁启超受了他的影响,但梁启超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和康有为在三世学说上的不同观点,从而对三世大同说有所发展。梁启超在三世大同说的主要(理论)内容上承袭了康有为的看法:人类社会进化历程可以划分成三个阶段,然后到达发展的终点。但是在其他一些次要(实践应用)方面,他则显示出了和康有为相左的看法。比如1897年的《新学伪经考叙》中,他依据此三世说对当下的中国下了一个判断:“尝试论之,秦以前据乱世也,孔教行于齐鲁,秦后迄今升平世也,孔教行于神

州。自此以往,其将为太平世乎”。^⑤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处于升平世。这和康有为的观点不一致,康有为认为当下的中国处于据乱世。这说明梁对中国的情况估计比康有为显得更为乐观一些。因为升平世相对据乱世来说,处于进化链中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。这种对当下处于何世的不同判断,是梁启超与康有为的一个显著分歧。这既体现了他们对现实的不同认识和评价,也影响到了他们对于时事的政策取向,使得梁启超更能接受民国时代的共和。甚至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—孔教在当下的实际意义也可能持不一样的看法。康有为支持孔教,是因为三世大同说的思想资源来自过去的圣贤,他要维护圣贤的传统。而对于梁启超来说,孔教可以在即将到来的升平世有用武之地。一个是往后看,一个是往前看。

三世大同说的具体内容是:据乱世,升平世,太平世。显然,所谓的据乱、升平和太平是以社会的稳定与否的结果状态来命名的。这一方面反映了封建时代割据动乱的现实,另外一方面体现了人们在动乱中对未来良好秩序的期盼。但是,社会是一个综合复杂体系。经济、政治与法制,家庭、社会团体和政府统统都被包含于这个包罗万象的社会概念中。因此,说社会的“乱”和“平”到底是指社会的什么?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。首先,在梁启超(包括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)那里,并没有意对政治、经济、法律和社会进行严格区分,^⑥因此,可以说社会和政治是一体的。其次,我们已经看到,“乱”和“平”指出的是一种结果状态。既然是结果,那么,追寻这种结果所以发生的原因就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情了。他说:凡天下事,无论大小,必有其所由来。治事者必须

作者简介:李军科(1975-),男,湖南邵阳人,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。

①由梁启超的著作来看,此时应该是第一次在梁启超的著作中出现达尔文的进化论。

②作为比较,在政治思想领域,西方传统中已经通过国家 state 和公民社会 civil society 这两个概念将政治与社会两个概念很明确地区分开来,尽管在 civil society 的含义上有着不同的理解。



查探到其发生的原因,然后“针对其原因,然后施方法,则方法必有功”。^①对于普通人而言,往往只能看到事件和现象的近因,而看不到远因,人们往往认为贫穷问题是纯粹的经济问题,社会秩序的混乱状态是一个失去水准的道德问题,但是梁启超认为,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可以溯源于政治及其善恶。换句话说,在梁启超看来,广义上的社会之所以会动乱不堪,其症结和远因正在于政治。因此,在梁启超那里,探讨社会治乱问题转化成了一个政治完善和进步的问题。那么人类政治发展是否有规律可循?如何变化?梁启超的回答是,政治的发展史的确有规律可循,变化的形式符合进化的普遍规律。1896年,他在《君政民政相嬗之理》中阐述了人类政治的发展进化规律:“治天下者有三世,多君,一君,民政之世。”^②我们看出,(1)他认为从君政到君的消失,完全变为由民主政是一个必然的进化过程。(2)君政要达到民政,还要经历君政阶段内部的嬗变,即从多君到一君。“变多君而为一君,谓之小康。”这样,政治领域内的“二世说”变成了“三世说”,恰好与社会三世相对应。(3)这里需顺带解释一下的是民政这个概念,此处梁启超将其作为与多君、一君相对应的词提出来,很显然是代表没有君主的完全民主世界。但是,这并不是民政一词在梁启超思想中的唯一含义。就20世纪初的实际而言,梁启超对君主还抱有期望,希望依靠皇帝来推行政治变革。所以,民政一词往往代表另外一种不那么激进的保守含义:君主广开民路,广纳民言,即与民共治的意思,而不取消君主制度本身。这种意义上的民政,本质上和孟子所言的保民是一回事:“孟子言民为贵,民事不可缓,故全书所言仁政,所言王政,所言不忍人之政,皆以为民也。”

从社会过渡到政治,梁启超的三世进化论还没有结束。因为政治是一个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概念,政治不会自己进化。政治的进化,最终还是必须依赖人的变化。没有人,也就无所谓政治。所以,如果要追寻政治进化的原因及其规律,就必须到人身上去找。而人的进化在梁启超看来,就是所谓人性的进化。梁启超曾经将人性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比喻。人性就好比空气,而政治则如寒暑表和温度计,当空气的温度发生变化,寒暑表的温度也不得不变化。所以他说:“善治国者必先进化其民”。这也是后来他提出著名的新民说的思想依据所在。人性的变化规律如何呢?梁启超坚信,人性的进步规律是从野蛮走向文明。1898年他在《读<孟子>界说》指出了人性是怎样进化的。他认为人性的进化历程也分为三级:“据乱世之民性恶,升平世之民性有善有恶,亦可以为善可以为恶,太平世之民性善。”^③他还援引了西方的学说作为依据:“泰西学者,分世界人类为三级。一曰野蛮之人,二曰半开之人,三曰文明之人。”^④梁启超说“此进化之公理,而世界人民所公认也。”如果联系到前面的最后一个政治发展阶段——民政之世,即人民当家作主的

世界,我们已经差不多可以预料梁启超会怎样回答这样一个问题:何以人民到了太平世的时候即可以实行当家作主,而在据乱世和升平世不可以?他的回答很可能是:当人性进化到一个比较高的文明阶段,人人成君子的时候,就再也不需要用君主或政府来保民卫民。因为人民已经可以进行自我管理。

至此,我们可以做个总结,梁启超的三世大同说主要运用于三个方面。从社会的角度来说,社会进化的轨迹是据乱世、升平世和太平世。从政治方面来说,是多君,一君和民政(即无君)三个阶段。从个体的角度来说,所谓的人性经历了性恶,善恶兼有,性善三个阶段。它们是一一对应的。可以用表格的方式做出对比。

人性	性恶	善恶兼具	性善
社会	据乱世	升平世	太平世
政治	多君	一君	民政(即无君)

应该说,梁启超的三世“进化”论对康有为来说是一种超越和完善。因为他将三世进化论在“内部”细分出来了三个层次:社会,政治和人性。三个层次之间的关系不是偶然的,有因果关系:从社会的平乱状态开始溯因,一直到人性的进化论。“国之治乱,常于其文野之度相比。”^⑤梁启超是一个喜欢追根究底的人。对于他来说,将社会的发展规律追溯到人性的进化,问题并没有得到最终的解决。因为,社会的治乱相替是因为政治在变,政治变化的最终依据在人性,但是人性变化的依据又是什么?他需要一个答案。

二、梁启超论达尔文的进化论

由于对抗、由于竞争,人性才得以不断“前进”,就像自然世界的基因一样,有竞争力的基因会传递给下一代,反过来说,留下来的基因是有竞争力的。文明就是一种适应竞争的人类“基因”。就人类相对于其他物种而言,是文明使得人类的竞争力强于其他物种。就人类这一物种内部而言,也正是文明和野蛮的程度,拉开了各个种族和国家之间的距离,形成了大小不同的竞争力。很显然,达尔文的进化论世界的显著特点正是以强调力量、竞争而著称于世。一句话,竞争是人性进化的原因。由于达尔文的进化论能够为梁启超提供一个他需要的满意答案,所以他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。

1902年,梁启超在旅居海外的时候,对国外的很多思想家都进行了研究。达尔文是其中的一个。在这一年,他写作了《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》。梁启超在文中讨论了达尔文学说的特点及应用。他说:(1)达尔文认为生物变迁的原因,其根本之处在于生存竞争。这种变迁,不是突如其来,而是慢慢地逐渐变化。(2)这种天然淘汰的过程,无休无止没有间断的时刻。(3)淘汰分为天然淘汰和人事淘

①张品兴主编:《梁启超全集》第一册,北京出版社,1999,339页。这里所谓“泰西学者”将人分为野蛮和文明的观点,的确在西方有悠久的历史,在近代可以追溯到卢梭、霍布斯等的自然状态,他们认为人类脱离了自然状态才是文明人。也还可以继续追溯到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。在古希腊时期,古希腊人自命为文明之人,将异邦人或不属于任何城邦的人称为野蛮之人。但是人性按历史时间以三个等级变化,却不是泰西学者的主张。



汰两种。由于梁启超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给中国人,不是为了理论而理论,而是为了实践而理论,因此,梁启超特别关注进化论是如何应用于人类社会的。主要有三点:第一,人事淘汰对于国家的作用。古代斯巴达人用人事的方法淘汰其子民,在子女初生的时候,要检验出生婴儿的体格。如果是羸弱者,采用丢弃或者杀戮的办法不令其延续,只留下强健者存活于世。结果斯巴达人因强武而获得竞争力。第二,进化论与教育事业有很大的关联。“盖今日文明世界,虽断无用斯巴达野蛮残酷之理,然知人之精神与体魄,皆能因所习而有非常之变化,以故近日学校,益注意于德育体育两途。昔维重教授者,今则尤重训练。可以悬一至善之目的,而使一国人,使世界人共向之以进。积日渐久,而必可以致之,此亦达尔文之学说与有力焉者也。”第三,“万物同竞争,而异类之竞争,不如同类之尤激烈。盖各自求食,而异类者,各有所适之食,彼此不甚相妨…欧洲人与他州之士蛮争,不如欧洲各国自争之甚也。而其争愈剧,则其所谓最适者愈出焉。”^[1]换句话说,人类社会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同类竞争,其激烈程度超过了人类与其他物种的竞争。我们看到,他所关心的三个核心主题是(1)尚武精神。(2)教育在进化淘汰中的重要地位,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德育和智育。(3)人类相互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,超过人与自然界的竞争。我们可以将这三点合并成如下表述:在人类的残酷竞争当中,如果一个国家或民族要想立于不被淘汰之地,就必须对自己的国民进行从尚武精神到德智的全面培育。后来他提出新民的概念,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炼而成:如何培育优秀的新民以强大国家,成了梁启超政治学说的重大问题。

尽管梁启超推崇达尔文,但他并不完全满意他的进化论学说。1902年,他研究了《进化论革命者吉德之学说》。吉德认为,(1)夫物之所以有生,其目的必非在自身也,不过谓达到彼之大目的(即未来之全体)之过渡而已。其所以有死,亦即为达此大目的之一要具也。(2)自然淘汰之目的,在使同族中之最大多数得生存。而所谓最大多数者,不在现在而在将来,故各分体(即个体)之利益,及现在全体之利益,皆不可不牺牲之以为将来达此目的之用。第一条是关于个体与群体的关系。第二条是关于现在和未来的关系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达尔文的学说就不十分令人满意。达尔文进化论的中心点是“之所谓优所谓适者,不过专指现在个人之利益或其种族多数之利益而已…无论何等生物,必当常变其状态,使有益于己,然后可以生存”,吉德(kidd)认为其不圆满者也恰好在此。因为,在吉德看来,达尔文专注于现在,忽视了未来。从而“今世政治学家群学家之所论,虽言人人殊,要之皆重视现在,于未来少所措意焉,是可为浩叹也。”^[1]这种评价是合乎梁启超的主张的。因为他始终坚信,人类社会的未来是可以预见并越来越好的。我们可以说,梁启超是在借吉德的话表达自己的观点。其次,梁启超还不满达尔文进化论中的个体主义。梁启超认为人是天生合群的动物。个体主义不能恰如其分地表达人的本性。于是,他觉得有必要去弥补达尔文进化论中的这两个“缺陷”。对于梁启超来说,可以采用的理论资源,正是他所擅长和驾轻就熟的中国进化论—三世大同说。因此,不仅仅中国的进化论需要西方进化论的解

释,反过来说,为了对西方的进化论进行修订,梁启超也需要中国的进化论为之作为补充。

三、结论:两种进化论的融合

两种进化论有着显著的差异。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不同:(1)从进化的原因上看,三世说没有提及进化的动力。而达尔文的进化则指出优胜劣汰的动力是竞争。我们已经看到,对于这一种差异,梁启超所采取的融合办法是宣称,人类社会从乱世最终达致大同之世(三世大同说)都是依靠力量以竞争(达尔文进化论)的结果。(2)从适用范围上看,中国的进化论只适用于人类社会,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则适用于整个生物世界,不适应者淘汰。这种差异比较好解决,只要断言人类属于自然界的一个部分,自然界如果有某种规律,那么人类也适用这种规律。其逻辑推理的三段式是:大前提:自然界存在规律L;小前提:人类属于自然界;结论:人类存在规律L。社会学家斯宾塞是这么做的,梁启超也是这么做的。(3)从进化的结果上看,达尔文的进化论是没有目的、不分等级的。竞争的结果只有适应与不适应的区别,并没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别。但是中国的、以“三世”形式出现的进化论却是有目的、分等级的。著名哲学家邓晓芒在论述中西文化错位的时候正确地指出:“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来,一到中国来,就引起了轩然大波,我们中国人把它看成人类总是要不断地进化,不断地要从低级到高级的提升。所谓的进化,绝对不是退化,革命绝对不是反动的,革命就是要前进的。”他认为“我们不应该用进化论这个词,因为这个所谓进化,其实跟退化没什么区别,进化就是退化,所以你不能说是进化论,应该说是演化,演变论,那还好一点。这就是说尽量地从自然科学的眼光,尽量地要把价值和目的论排除出去,进化论引起人的遐想,就是说好像历史有一个目的,然后我们再朝着那个目的前进。目的在那里呢?在宇宙中没有那个目的。”^[2]在梁启超而言,这种“错位”正是他企图用中国三世大同说去融合弥补西方进化论的结果。在三世大同进化论的影响下,梁启超坚持认为人、社会、国家都是在逐步往“好”的方向发展。其融合的方式是宣称人类社会竞争中竞争的结果是等级“逐渐往上”,越来越好,最后的等级是人类能达到的最美好的社会——大同。换句话说,他是从中国的进化论那里摘取了进化的目标,而从西方进化论那里摘取了进化的动力和过程。不管人类社会的发展客观上是否是那样的目的,但梁启超等为人类历史“安排”了一个目的——即大同社会是肯定的。他通过这种中西“嫁接”的方式,在西方达尔文进化论的“身躯”上安装了一个“大同”之世的“头”(目的),实现了中西两种进化论的巧妙融合。而这两种进化论一融合,就很快为其在20世纪初接受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开辟了道路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张品兴主编.梁启超全集(第一册)[M].北京:北京出版社,1999.
- [2]邓晓芒.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[M].重庆:重庆大学出版社,2008.

责任编辑 文 嵘